

## 香港中文大學教學語言的論爭

香港中文大學

張雙慶

### (一) 開頭的話

香港學校的教育語言，多年以來一直爭論不休，這與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有關，與實行英文中學、中文中學兩軌制有關，與粵語是強勢方言有關，隨著1997年主權的回歸，問題越發複雜。以前的論爭，主要集中在中學階段。2005年初的《哭中大》一篇文章，以大字報的形式發表，開始了大學階段教學語言的論爭。事情發生在中文大學（以下簡中大），很多問題也只有中大才會發生。但這個事件仍有它的典型意義，值得其他雙語以至三語地區大專教育界人士的關注。

### (二) 事件的緣起

上世紀的九十年代前，香港只有兩所大學，即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二者學制不同，前者是英制的二年預科加三年大學本科，後者是其他地區通行的四年本科。港英政府八十年代後一直要中大改為英制，但遭到中大頑強的抵制。之後，隨著中英談判主權回歸，港英在撤離前作了部署。在高教界，港英增加了大學的數量，由二所大學一下子增至八所，美其名是為香港培養人材，以填補大量港人移民外國的真空；事實是消耗財政儲備，並留下為香港育才的美名。為加強英國未來的影響力，新設立的大學都實行三年的英制，把中大孤立起來，逼使中大屈服。中大被迫於1991年改用靈活學分制，招收讀了二年預科的學生，絕大多數的學生都可以在三年間修畢所需學分畢業。教學語言方面，除了香港教育學院，其他六間大學都採用英語；行政上，也是以英語作為工作語言，即使幾個中國人開會，也全用英語。在香港八所大學中，採用雙語的，只有中大和香港教育學院，後者是出於培訓師資的需要。九十年代中，在英國習醫的李國章教授出任中大校長，開始鼓勵以英語授課，

具體的措施是，改用英語者，每門課學系可以獲得十萬元的額外經費。鑑於這個措施太敏感，當時並沒有大加宣揚，甚至記者查詢，校方也加以否認。其後，李校長改任特區政府教育統籌局局長，因為找繼任人需時，金耀基教授曾短期出任校長，這期間教學語言的事情也靜了下來。2004年中史丹福大學經濟學教授劉遵義出任校長，可能客觀形勢有了改變；也可能是大學國際化，採用英語教學是劉校長的理念；又或者是他要繼承李國章教授的路向，總之，用英語教學的步伐加快了。2004年底，校方向各系發出通告，要他們承諾有多少科目會採用英語/普通話授課，而且明確表示，假如不能承諾足夠的英語/普通話科目，則該系不得招收外地生/內地生。由於事先沒有足夠的諮詢，消息一傳出，就出現了劇烈的反響，《哭中大》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了，有不少校友和學生加入聯署。

### （三） 對立雙方的意見

主張採用英語/普通話教學，最堂皇的理由是國際化，在經濟全球化的巨浪下，學術活動也同樣要全球化。爲了更好的和國際學術界接軌，爲了畢業生有足夠的英語能力應付職業上的需要，在本科階段學好英語，對大多數的科系的學生來說必須的。至於學好普通話，也和中國的崛起，內地經濟快速發展，不少畢業生會到內地工作有關。此外，回歸之後，中港來往頻繁，學好普通話是現實的需要。

國際化的一個步驟是先把校園國際化，因爲招生來源擴大了，校園有來自各地的學生，自然會營造出多元文化的環境，有利於開拓學生的文化視野，這對學生是有利的。而現實一點說，既然招了外國學生、內地學生，就必須保證他們有足夠的學科供他們選修至畢業。中大的選科資料冊上附有教師授課語言，有 E（英語）、P（普通話）及 C（廣州話）之不同。的確有教師的科目注明用英語到上課時應大部分本地學生要求而改用粵語，致有外地生因未能溝通而投訴至校方，甚至要求轉校，中大的語文政策就是爲了解決這一問題。

大量招收外地生/內地生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把香港建設成東南亞高等教育的

中心，把高等教育產業化，使香港的經濟可以向知識化轉型。這些，校方不說，但從一些資料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香港政府新聞處於05年5月27日發出的新聞稿《港輸出高等教育潛力獲肯定》說：

教育統籌局表示，由貿易發展局委託獨立機構進行的研究，肯定香港學生國際化的教育效益，以及本港輸出高等教育服務的龐大潛力；而多項利便非本地學生來港升學的新政策，也是為了推動這方面的發展。

美、加、英、澳這些高等教育服務輸出國的巨大商機，早就有目共睹，香港在向「知識型經濟」轉型的政策，找到高等教育這一塊，實是不足為奇。今年外地生中大學費港幣八萬元，港大十萬元，都不是一個小數目。當然，特區政府不會直接指令大學收外地生，在學術自由的招牌下，具體的措拖由各大學自行決定。

反對派中，以在校學生和校友佔多數，他們多從中大在香港的地位，從建校的背景及傳統立論，認為中大改變教學語言，是放棄教育的理想，是對創校先賢的背叛。《哭中大》說：

中文大學，一所曾經在殖民地時期勇敢地以「中文」來確認自己身份的大學，一所曾經在七十年代勇敢地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大學，一所曾經以支持母語教育和提倡中國文化為己任的大學，在回歸後的今天，竟然自動地不加任何批判地集體放棄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傳統，為的不是什麼教育理想，為的只是在「國際化」包裝下的經濟利益，徹底向教育商品化投降，怎不令人痛心，怎不令人捶首頓足？我們又可以如何面對我們的創校先賢以及一代又一代中大人所付出的努力？

另一方面，反對派搬出大學法例，試圖說明擅改中大教學語言是違反中文大學法例的弁言（Preamble）的，該弁言說 It is declared th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which the principal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shall be Chinese……中文譯作「現宣布香港中文大學（其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弁言的話是否有法律效力，至目前仍未能很好的澄清。

反對派還提出母語有助於學習的意見，這些意見早在中學教學語言的討論中已耳熟能詳，意義不大。有人認為，大學裡的很多學科都來自西方，未必有夠新夠水準的中文教科書和參考書，甚至沒有齊全的中文詞彙。大學中某些科目用英語教學，有客觀的原因。但反對者引用三十年前中大孫述宇教授的意見，認為中大必須有志氣，培植這些西學在中土生根、開花、結果，孫氏說：

面對這些困難，可走的路不外兩條：一條是培植這些西學在中土生根。這條路要譯製出齊全的中文專門詞彙，寫出或譯出中文教本與參考書，用中文講授、討論、練習，使這些西學終於歸化中國。另一條路是我們甘心用英文來學習這些西學，以後也用英文來作深入研究，不移植這些學問到中土，而叫中國人世代代用英文作學術語文。

很明顯，第一條路並不好走，要遭遇不少困難，要做許多基礎工作；但是第二條路是不能想像的。即使我們不走第一條路，我們的後代早晚也要走的，但這樣的中國的學術就遲了起步，我們的後代要罵我們。<sup>1</sup>

中大哲學系關子尹教授也有類似的意見，而且說得更透徹：

要知，大學講堂乃一民族之語言最重要的「作育」場地，往往也是老師的學術思想最能發揮原創性和得以凝聚的場合；更重要者，大學講堂是一民族的學術文化和知識價值跨代傳承的最重要機制。所以，在以本國學生為主的情況下，捨母語而全面以英語授課，從教育上看固然違背語言現實，而從文化政策上看更是「自毀長城」。香港多所大學一直以來強制要求老師以英語授課，是從未充份考慮語文作育的文化使命，其經驗不足師法之餘，反更顯出香港中文大學一直堅持的文化角色的重要。可惜近日中大為了國際化的目，正在誘探各系來年能否提供足額英語課程以收取外地學生為主修生的措舉，加上近年全國重點學府如北京大學也曾對師生作類似要求

---

<sup>1</sup> 孫述宇《使用中文是中大使命》，收入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編《令大學頭痛的中文》，頁6-頁7。

等，這些發展都是令人憂慮的。<sup>2</sup>

這些意見，直接影響了在校學生的思考，例如杜振豪 2006 年 8 月 30 日的《來把中文國際化》的觀點，便明顯的受到上述兩位教授意見的影響。<sup>3</sup>

#### （四）校方的對策

為了解決這場論爭，校方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由退休了的金耀基校長任立席，委員包括校董會代表，主理教務的副校長，教務長，學生輔導長，各學院老師代表，校友代表及學生代表等，由這個委員會負責研究中大的語文政策，撰成報告書，供校長考慮後推行。委員會至今年六月，已開了超過二十五次會，報告書經過諮詢後，也已完成定稿，現正等待校方公佈。對教學語言問題，委員會有以下幾點較為重要的看法。

第一，從委員會的定名看，校方以「雙語」來回應採用英語的指控，堅持中大從來就是中英並重，校內實行的雙語政策，與香港社會上鼓吹的「兩文三語」一致。

第二，對授課語言作了新的界定，在廣義上包括教與學所用的語言。報告認為授課語言應根據教學的實際需求和使用作多方面理解，除「課室講課語言」外，授課語言還當包括閱讀材料/參考資料、導修討論、專題研究/課堂報告、實驗/實習/臨床、習作/考試、個別指導等各方面所使用的語言。在這樣的界定下，原來全用英語的醫學院也有不少中文，因為臨床實習時，和病人談病情百分之九十是粵語。

第三，根據學科性質，參考以下原則決定課室講課語言：

1. 凡是普世性高，較少強調文化特殊性，而學術載體以英文為主的科目，例如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工程科學等學科的有關科目，為求概念的表述更能直接準確，並能與國際接軌，宜用英語講課。
2. 凡是較多強調文化特殊性，而學術載體以中文為主的科目（特別是涉及

<sup>2</sup> 同上，頁 33。

<sup>3</sup> 見 2006 年 8 月 30 日《明報》《論壇》版。

中國文化、社會及歷史的科目)，或討論人生哲理的科目，宜用中文（粵語或普通話）講課。如有實際需要，可增加以普通話講課的比例。

3. 凡是較多強調文化特殊性，而學術載體中英並用的科目，特別是部份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科目，可採用中文（粵語或普通話）或英語講課。
4. 凡涉及香港社會、政治、文化等科目，宜用粵語講課，以保育本土語言，促進本地社會文化的發展。

第四，面對高等教育多元化和國際化的大方向，為避免英語過份主導以致中文失位，保育中文是中大應盡的責任。委員會建議一系列措施推動保育中文的工作。例如在研究方面，中大應繼續支持中文、中國文化及本地文化的研究，同時也鼓勵在其他領域以中文發表高質量的研究，並肯定其學術成果。中大應致力以中文傳播知識，如出版中文學術期刊及書籍、編寫高等教育及專業領域的中文教材，推行學術著作的翻譯工作。這一點，可以說是回應了關子尹教授的呼籲，Language Care 在關教授的文章中譯為「作育」，其後更多的人稱為「保育」。

這些意見能否獲得中大師生校友的接納，尚未可知，預計仍有爭論的是，在按學科性質決定教學語言的原則下，教師是否有足夠的自主權，以求取最佳的教學效果。還有決定什麼是普世性，什麼科目的文化的含量高這些論題上，都不容易有清晰的界定。

## （五） 一些思考

1. 這場論爭，撇開背後歷史恩怨與人事的糾纏不說，可以看作是理想與現實之爭。校方以現實的態度，謀求大學的發展，爭取學校的學術地位，以至為畢業生謀求出路，因而主張增加普通話和英語的應用，其中就有現實的考慮。反對的意見，則是對創校理想的堅持，這裡我們引用孫述宇教授的話來代表理想派對中大的期望：

一所學校裏，往往是那些不能直接看見的東西，才是要緊的，比如學風、士風都是。假設中大能面對重大的困難而執行一項堅定的中文教育政策，

使畢業生都能用中文思考、治學、處事，並使中文中小學教育的頹勢得以改良，那才是偉大的成就<sup>4</sup>。

一個人，以至一個機構，是追求理想，還是屈服於現實，如何抉擇，如何取態，變數甚多，不能一概而論。估計中大的這場論爭，還會延申下去。

2. 語文問題從來都是敏感的，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更富有政治和文化的內涵。中大教學語言的論爭，既有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又有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於1997年回歸中國的小背景，更有中大本身成立過程的特殊背景，使這個問題變得復雜又富爭議性。

以中大的歷史和組成來說，最早的三間成員書院以新亞書院最具人文色彩，校友們秉承著創校先賢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遺願，希望中大能在這方面發揚光大。對於中大採用英語教學，新亞書院校友最爲之痛心疾首，這是可以理解的。這其中，又有對中大的命名有誤解者，例如梁巨鴻的《中文大學的中文》說：

……偏就中國人的大學，要叫中文大學呢？這其實是有一個歷史的因素的。當時的立意是，在殖民地統治下，要辦一所中國人的大學。這自然要排除殖民地的影響，希圖達到用自己的語文去討論學術的目的，所以才稱爲中文大學。把中文和大學連在一起，不但冀望於大學的中文化，更要緊的還在中文的大學化。<sup>5</sup>

這段話是梁先生對成立中大的美好願望，未必合乎事實。中大命名的原意，可參看唐君毅先生的說法：

中文大學創辦時，定名也是一個問題。新亞主張用華夏大學或者南海大學，這些名稱之中國的意味比較顯豁，不幸不得他人的支持，而沒有通過。由於大學的名稱定不了，報界方面覺得新大學總是以中文授課的，就稱之爲

---

<sup>4</sup> 同注1頁15。

<sup>5</sup> 同注1頁65-66。

『中文大學』。所以，『中文大學』這名稱，其實是社會人士喊出來的。『中文大學』的名稱可含有三個詞義：(1)用中文語言為主要教學工具的大學；(2)中國人治理的大學；(3)以中國文化之傳承與發展為教育目標的大學。新亞書院則特別著重第三個解釋。<sup>6</sup>

可知，中大的命名，與教學語言關係只是三分之一，而且不是最主要的。因為名稱上的誤會，使得不少人產生不切實的期望，並使語文問題成為中大最敏感、最棘手的問題。

另外一些人，對英國人能打破殖民地的慣例，在殖民地成立第二所大學，還以被殖民者的語言作為教學語言的做法，大加讚賞，賢如唐君毅先生，也說中大的成立，是英國教育史上破天荒與史無前例的事<sup>7</sup>。我個人反而認為這正是英國人狡猾的地方，港英政府誠然為香港的中國青年做了一件好事，但它也利用中大這個校名來宣揚自己的「德政」：你看，我們殖民者也尊重你們的文化，為你們創立大學，你們還不感恩戴德。中文大學這個名字，和港英其他冠以「中文」名稱的活動，如「中文文學獎」之類，都帶有殖民色彩，聽起來怪怪的，不值得推許。更何況，把當時獨立而具規模的中文大專學校收編起來，有盡收天下兵器，使大專院校盡入港英政府「彀中」的陰謀在。

中文大學和「中文」關係最密切的，是它的成立，確是為了使中文中學的畢業生有出路，可以升讀大學。回歸之後，特區政府鼓吹母語教學，只有117所中學可以用英語授課，其他的三百多所中學則用中文教學，二種學校的分別原是學習工具不同，但實行起來變成能力上的區別。大多的情形是有能力者上英中，無能力者上中中。中大改用英語授課，中中生入大學就更加困難了。中大五十年前因為中中而成立，但當前對中中的發展完全不加援手，這在道義上是說不過去的。

香港社會有這麼一批人，他們有濃烈的民族感情，在英治期間，受殖民者這樣

<sup>6</sup> 唐君毅《新亞的過去、現在與將來—1973年6月17日新亞道別會演講會講詞》，收入《新亞教育》頁155-156頁，香港：新亞研究所。

<sup>7</sup> 引自莊耀洸《中文大學監守自盜？》，同注1頁137。

那樣的氣，英文不佳，屈居人下，期望回歸母國之後，這種情況會有改變，中國人何以揚眉吐氣。但事實是，回歸十年，這種情形並沒有出現，重英輕中仍是社會上普遍現象。香港不像斯里蘭卡，不像馬來西，在脫離殖民統治後，限制英語的使用，改用本土語言。相反的，一些香港人，自以身為華人，沒有了殖民者的顧忌，反而肆無忌憚的主張使用英語，這種現象，使不少有心人失望。中大主張用英語教學引起劇烈的反對，可能與這種心理有關。

3. 中大校友學生反對「國際化」，反對改用英語教學，主要是針對英語的霸權主義，對普通話的問題，著墨較少。但因為在不同地方都提及對粵語的關注，我們可以看出，反對者不敢明目張膽的把方言和共同語對立起來，所以論點只是正面提出粵語的存廢，沒有針對普通話，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部分港人的心態。是次論爭最早的文字《哭中大》就說：

我們自身的學習經驗，以及很多國家無數的教學實踐表明，用母語學習，是吸收知識最有效的方法。英文不是我們的母語，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是使用英語。因此，用廣東話上課，對大多數同學來說，對理解學科的知識、積極參與討論，以及培養我們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都是最自然最舒服最有效的方式。

而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對雙語政策委員會諮詢文件的初步回應》的第三點就認為諮詢文件的「主要目標其實是增加英語教學，相應地也就要限制漢語特別是廣東話授課」。而最直接與最大膽的意見，一是出自一張用粵語拼音書寫的大字報，譯成漢字如下：

佢上堂用英文咩？我地啲佢都躑居，我地照講番廣東話！廣東話喎！我地由細用到大，最活潑嘅語言！交換生唔識廣東話咩？我地教佢！鬼佬亞 Sir 唔識廣東話咩？我地又教佢！總之中大係為香港人起嘅大學！目標點解唔係為香港青少年提供「知識」，或者係釋放香港青少年人嘅靈魂呢！<sup>8</sup>

---

<sup>8</sup> 大字報的署名 ah chiu「阿超」。

二是出自杜振豪的文章《來把中文國際化》一文末句：

中文大學需要立足本土，方能於中國化、全球化浪潮下不被淹沒。<sup>9</sup>

「中國化」的提法，在其他討論文章是極少見的，這反映了某些香港青年的心態。粵語在中國方言中原就是相當強勢的，近年來，由於和諧社會的提倡，內地給予方言生存空間比以前大很多，出現了鼓吹粵語的網站，報紙有了「白話廣州」版，電台、電視有粵語節目，這都是以前少見的。在香港，近年的粵語正音運動，也是廣州話佔有壓倒性優勢的表現。加之最近的一些「本土行動」，要求保存集體記憶，保存古物與建築（即使只有四五十年的歷史，帶有殖民地色彩的東西，如皇后碼頭），是上述推崇粵語論點的背景。廣州和香港原來就是粵語的天下，是普通話推行得最差的地區。香港人很現實，知道回歸中國是鐵一般的事實，所以不會明目張膽的反對用普通話，近十多年自動自覺的學普通話，家長把子女送進普通話班。但骨子裏，大廣東的意識仍然揮之不去，所以就出現了上述這種曖昧的態度和立場。

委員會對於粵方言的態度，其實十分正面，尤其是報告中特別指明通識教育科，以及涉及香港社會、政治、文化等科目，宜用粵語講課，以保育本土語言。這項建議，有人給予好評，例如中大教育學院蔡寶瓊教授論為報告書「肯定了中文以至廣東話的學術地位，澄清了兩者的關係」<sup>10</sup>，的確，通過報告書的建議，粵語在大學的講室中可以有自已的位置，這在香港高等教育界還是前所未有的事。

（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仍未公佈，本文內容請暫勿引用，謝謝。）

---

<sup>9</sup> 同注 3。

<sup>10</sup> 《對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的回應》，2006年11月15日。